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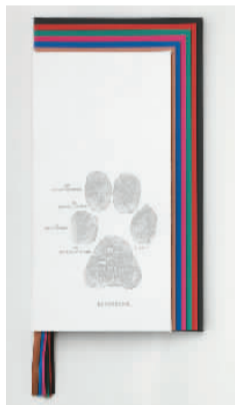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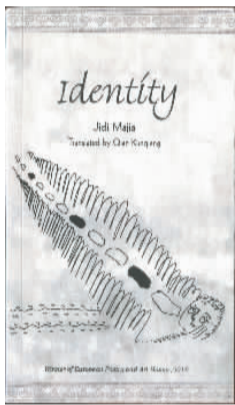
◎作家近况

对话吉狄马加——

“诗歌是我们灵魂相通的纽带”

本报记者 张鹏禹

我是这片土地上用彝文写下的历史
是一个剪不断脐带的女人的婴儿
我痛苦的名字
我美丽的名字
我希望的名字
……
啊，世界，请听我回答
我——是——彝——人



▲部分吉狄马加诗集译本

在这首《自画像》中，吉狄马加用排比、回环和抒情的方式塑造出一个大凉山生长起来的彝族诗人形象。他通过汉语勾连起古老传统和异域文明，用精粹的语言生成融汇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诗歌表达，架起沟通中外诗歌的桥梁。文明因互鉴而发展。吉狄马加曾多次提到：“诗歌是我们灵魂相通的纽带。”在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方面，诗歌有哪些特殊作用？近日，本报记者对吉狄马加进行了专访。

有新的创造。可以说，当代中国诗歌与世界诗歌的交流，是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

问：您的长诗《裂开的星球——献给全人类和所有的生命》，展现出对全人类命运的关切以及对战争与和平、政治与哲学、宗教与文明等命题的持续思考，引起广泛反响。能否谈谈这首诗创作的背景以及您想表达的主题？

答：我创作这首诗是2020年4月。众所周知，疫情深刻改变了世界，我们无法逃避，但可以选择一种正确的方式去面对——那就是紧密团结在一起，把地球当作我们共同的家园。一个人的生命固然短暂，但当我们把这个星球放在浩瀚的宇宙中加以观望的话，它的生命或许也是有限的。这个星球所承载的一切动物和植物，都是它的组成部分。我们没有理由与它们对抗而不去善待它们。这首诗的结尾表达了我对世界和人类最美好的期待：“是的！无论会发生什么，我都会执著而坚定地相信——太阳还会在明天升起，黎明的曙光依然如同/爱人的眼睛/温暖的风还会吹过大地/母亲的怀抱/还在哪里嬉戏/大海的蓝色还会随梦一起升起，在子夜成为/星辰的爱慕……”

诗人是人类文明的儿子，更是时代的见证者。诗人不能在现实中成为隐身人，更不能把自己变成超然物外的旁观者。社会性写作固然是诗人的一种责任，更重要的是，诗人的身份要求他不能在重大事件面前选择沉默。

问：您认为诗歌在促进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心意相通方面，有哪些特殊作用？

答：委内瑞拉诗人欧亨尼奥·蒙特霍曾在诗中写道：“地球转动让我们靠近/它自转也旋转在你我心间/直到我们在梦中相见/一如《会饮》篇中所言/过了多少个夜/下过雪/冬至也去了/时光流逝/分分秒秒/恍若千年。”诗人表达的思想与中国古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精神是一致的。人类伟大的文明，都有很强的包容性。对于民族与民族、心灵与心灵之间的沟通来说，诗歌是一种深度的心理交流。彝族有一句谚语：诗歌就是语言中的盐



郭红松绘

巴。盐巴对人类而言是珍贵的，诗歌也是民族语言里的精华。事实上，诗歌、音乐和绘画等表达人类精神情感最基础、最根本的东西，是人类精神顶峰上的东西。

今天的世界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世界，人类命运前所未有地连接在一起。如果说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是把世界连为一体的前提，那么文学就是让我们灵魂彼此相通的纽带。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文学交流可以成为国与国之间增进友谊互信的“助推器”，也可以成为处理双边摩擦的“减压器”。

问：您的诸多作品被海外读者熟知有赖于翻译家的努力，您认为在促进中外诗歌交流、人文交流方面，应该如何推动中外文学互译？

答：我不能想象，没有翻译，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可以肯定的是，对不同民族间文学经典的翻译，或者说更大范畴的文化间的翻译，影响了我们自身古老文明的进程，同时也给不同文明间的相互借鉴提供了多种可能。16世纪曾在中国澳门生活过的葡萄牙诗人路易斯·瓦斯·德·卡蒙斯，是一位在东西方交流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他的8000余行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以及大量歌颂爱情的十四行诗，据说大部分都是在旅居澳门时完成的。不难猜想，现实的东方给他带来了心动和灵感。熟悉现代西方诗歌史的人也都都知道一段翻译史上的传奇，那就是如果没有诗人、文学评论家埃兹拉·庞德把中国唐诗和日本俳句翻译成英语，就没有意象派诗歌和后期象征主义诗歌在修辞和意境里呈现出的东方独有意象。这不能不说是翻译和交流给诗歌带来的意想不到的成果。

要真正做到中外文学的高水平互译，没有捷径可走，只能不断开展深度的文学对话和交流，增进相互了解。翻译诗歌要比翻译其他文学门类更难，我的一个体会是，好的译本往往都是所在国诗人参与翻译的，或者说是以诗人为主体来完成的，这是最有效的翻译。我的大部分外文诗集证明了这一点。作为诗人，还要找你信任的有能力的译者来完成翻译工作。

旧时江南有两个地方自有别称，上海曰“海上”，杭州为“湖上”。湖上者，西湖也。8年时光，乍暖还寒，寻寻觅觅，重整旗鼓，几度推翻再来，今年3月，我的长篇小说《望江南》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巧得很，踏上了小说题目的节奏——此刻，正是西部龙井春茶采摘之际、陌上烟雨柳絮飘浮之时。

1991年开始创作“茶人三部曲”时，我并没有想过，许多年后会再写一部杭氏家族茶人命运的长篇小说。抗战胜利到上世纪60年代这段历史，“茶人三部曲”没有涉及。因为当时的我，尚无能力把握那个时代的茶之调性，也缺乏资料搜集。多年后推出的《望江南》，正展现了这段历史的风云变幻和茶业发展脉络。

“望江南”原本是唐代教坊曲名，后来渐成词牌名，又称“忆江南”“梦江南”等。唐时当过杭州刺史白居易有《忆江南》，至今脍炙人口：“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然后便是北宋杭州太守苏轼的《望江南·超然台作》了，其中“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之名句，向来被茶界引为格言。而我的《望江南》为题，正是因为对苏东坡词中因茶表达的生命态度有着高度认同。因为有茶，生活不会被以往和以后的艰辛消磨了真正的意义。

1949年以后的华茶，的确是起死回生，我尽力想在小说中写出一组人物群像，也即杭氏家族与茶共生的命运图谱。这其中，杭家主人杭嘉和始终是我看重的人物。其实，许多年前，当人们与杭嘉和讨论小说中最理想的茶人是谁时，我就坚定地认为是杭嘉和而不是杭天醉。但我也知道，只有当这部《望江南》中的杭嘉和出现后，完整的茶人形象才得以真正确立。茶人精神有许多种诠释，



◎创作谈

湖上望江南

王旭烽

但于我而言，最鲜明的特质，在公元8世纪的唐代，陆羽就在《茶经》中告诉了我们——“精行俭德”。茶人不是一个没有边界的宽泛的认定，他们具有内敛、自省、宽容、智慧而又有弹性的文化气质，是我们民族中承担起君子风范的一类人物样本。这样的理想人格并非从某一个时代横空出世，而是伴随着茶与人类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熏陶浸润而成。这是一种恒常的民族品性，温良恭俭、渐进渐行。我在《望江南》中努力想呈现的，就是这个大家族守恒的情怀。他们虽然个性不一，命运各异，但在“精行俭德”的茶脉传承上，是一以贯之的。

我没有刻意避开时代的风云际会、茶在其中的波澜起伏以及茶人命运的百转千回，什么样的命运向他们走来，他们就迎着什么样的命运迎面而上。而茶的兴衰、建设与塌方有时同步进行，有时错落呈现。这是个触底反弹、总体进步的好时段，但茶产业振兴与否，并不是我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我真正关注的，是一个中国人，不论岁月如何变幻莫测，都具备的恒常的生命定力以及他们智慧的应变能力。山中生出的嘉木，用水冲泡的茶汤，山水品格与这些茶人同构，使得他们既仁厚又知性。这样的人，就生活在芸芸众生中，他们也自认为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份子。也因此，我笔下的茶人，是非凡的人，我只不过想把他们写出来而已。（作者系茅盾文学奖得主）

倘佯在“古典的春水”间

本报记者 张鹏禹

“莺初解语，最是一年春好处。微雨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近日，古诗词随笔集《古典的春水：潘向黎古诗词十二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12章围绕近60位古代诗词名家的100余首古诗词进行沉浸式赏鉴，前6章分别从“多情”、“怀旧”、“愁绪”、“女性美”、“时间”、“艳美”6个切口入笔，远至《诗经》，近至《红楼梦》，个中诗词信手拈来，别出机杼；后6章以创作者划分，逐一扫描中晚唐诗人、宋初词人、苏轼、辛弃疾的名篇佳构，既一往情深说妙处，更健笔纵横论古今。

在“未有情深而语不佳者”一章中，作者比较李白诗中的“天地皆震动”和杜甫诗中的“一舞剑器动四方”，认为后者更完美，因为后者是诗人的“动心”之作。在潘向黎眼中，“情深，则流畅是澎湃，冷涩是沉郁，凌乱是顿挫，半含半露成了若悲若泪，戛然而止自有无限余味。情深，则表达就不成问题。”在“行走在时间的旷野”一章中，作者剖析怀古诗主题，认为有4个类型，分别是：慨叹时光无情，人生短暂；慨叹世易时殊，物换星移，兴废更替；赞颂或同情某个历史人物；感喟王朝兴衰、人世沧桑。但所有的怀古诗，其实又都是“被击中的伤口上开出来的花”。在“每一片落叶、每一瓣残花都被看见”一章中，作者形容自己阅读中唐诗歌的感受：“诗读到中唐，就像走进这样一座秋山。树枝

上、空中、地上，都在上演秋天的离别大剧，满目的黄叶和枯叶，温暖和湿润已经不再，而秋日已斜，光线暗淡，整个世界分外萧瑟，秋气扑面。”其中既有对诗歌美学特质的精准把握，又富于文字美感。

潘向黎不仅从诗学角度评点千古名篇，更从自己的主观生命感受出发，以情解文，举凡父女亲情、佳人爱情、故友情谊，皆在书中有所呈现，字里行间涌动的是一份跨越千古、悲欣相通的赤诚之情。在序言《杜甫埋伏在中年等我》中，潘向黎从自己与父亲潘旭澜围绕杜甫的分歧写起，写到父亲的离世，写到古诗词陪伴她渡过难关。“我从末为无数次击节的李白、王维流过眼泪，却在那一天，独自为杜甫流下了眼泪。原来，杜甫的诗不动声色地埋伏在中年等我，等我风尘仆仆地进入中年，等我懂得了人世的冷和暖，来到这一天。”正是这种熔铸生命体验的理解，让此书成为一部与古诗词“性命相见”之作。



◎新作推介

作为“总体性”的王蒙

——读《猴儿与少年》

于京一

匈牙利文学批评家卢卡奇将历史看作是感性、动态且包容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体，并寄希望于小说这一现代文学形式以达成某种超越，实现“总体性”的复归。

就当代文坛而言，王蒙是为数不多可以呈现并有能力实现卢卡奇哲学梦想的作家。王蒙经历过新中国成立前直至当下中国各个时段的历史大潮，他是作家、主编、批评家、文化与政治活动家，多重身份的叠合决定了他必然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存在。而生命的长度、阅历的厚度、思想的深度和激情的强度，使王蒙深入而丰富地介入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特别是文学生活，其长篇小说新作《猴儿与少年》，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耄耋之年的王蒙，站在个体人生的顶点，回望历史、俯瞰世事，深远宏阔的阅历与眼界，使其更易回归总体性的人间现实与历史理性。在《猴儿与少年》中，他的指点江山或自我抒怀，于无形中裹挟着历经风雨的复杂况味：幽默、揶揄、慷慨、豁达、较真、宽容等诸种富含生命质感的叙述姿态相互碰撞，交织为一体。小说安排主人公施炳炎（鲑背老人）和王蒙（老董老人）进行意识流式的跳跃性、片段式的谈话体叙述，一方面贴

合老年人的思维特征与交流语态，另一方面以长寿之人的视点来完成对个体与历史关系的评判。这种叙述方式至少呈现出三个特征：时间久、体量大、穿梭自由。在时空的恣意穿梭中，人物主体既实现了对往昔的回忆、对当下的体验和对未来的展望，又不失时机地从一生体验中展开对历史及历史中人的总体性审视与评判。毕竟，很多细部的东西，唯有在更久远的回望中才可能真正闪耀出意义的光芒。

《猴儿与少年》关注的中心是人，它的反思性既体现在对过往历史的深刻洞察上，更体现在对历史主体（人）的重新打量 and 裁定上。小说开篇回望上世纪50年代末时，揆弃了教科书式的冷漠评判，而代之以一种辩证理性的还原式展开与回望式品味，并辅施炳炎青春个体的热情参与和切身体验。这让作品有一种扑面而来的质感和温度，散发出热辣辣的生活气、时代气息，既有时人的兴奋、热烈、快乐、嫉妒和斗争，也有耄耋之年的回顾往昔时的叹惋、和解、快慰与哀哀。百年回眸，王蒙展现的不只是“青春万岁”，更意在阐明“生活万岁”与“生命万岁”。《猴儿与少年》虽然篇幅不长，但



颇具史诗品格，其中的主人公是活生生的丰满的人，呈现的是火热的火热的生活本身，其最典型的特质是家国一体，个人与历史浑然交融。一方面，人物的生命历程赋予历史以鲜活形态和可感的温度，让历史以充满热烈与激情、纯真与挚爱的活潑面貌一一呈现；另一方面，历史也赋予个人主体性，给人以自豪、自信甚至自恋。在历史构筑的巨大风洞里，个人并非只是任由其裹挟的无奈的枯枝败叶，而是真挚地燃烧了自我，奉献了力量，这是王蒙的历史观，也是他在小说中希望表达的。

具体分析小说的主人公施炳炎，其历史主体性，鲜明地体现在从城市来到农村，在筑路、背篓中实现身体重塑的过程。他将1958年进山的这一天看作“新生”的起点，因为在这天的负重跋涉中，他猛然发现了自己“累不死也折不断的身子脖子关节四肢”，发现了自己坚强皮韧性的“耐苦性”和“预应力”，他是“砸不烂推不倒碾不碎”的。随后在大核桃树峪的体力劳动中，施炳炎只3天“就感悟

到了十根手指头加热、加粗、加力、加硬度、加生长”，劳动一周又发现了手掌上的坚硬茧子以及身体力量奇迹般地增强。这些慢慢苏醒的身体体验，意味着被压抑的青春爆发与兴奋，沉重的劳动唤醒了生命的力之美，展示出发敬的仪式感和救赎感，由此发现并熔铸了新的自我。在之后“最迅速、最自然、最放任任性痛快淋漓”的雨季造林中，主人公感受到的“逍遥奔放、自由天机、恢弘驰骋，天地大美，道法自然”的人文“狂欢嘉年华”，让主体之美获得了进一步的较大释放。

当然，这种历史主体性的凸显不仅体现在小说中人身上，而且发自作家肺腑。在一次访谈中，王蒙说：“我赶上了激情的年代，沉重的苦难、严肃的选择、奋勇的冲锋、凯歌的胜利，欢呼与曲折，艰难与探索，翻过来与掉过去……而我活着经历了、参与了这一切，我能冷漠吗？我能躺平吗？我能麻木不仁吗？我能不动心、不动声色、一式36.5℃吗？”这种历史主体意识的凸显，显然也是“耄耋少年”王蒙能写出《猴儿与少年》的原因。

《猴儿与少年》的宏阔与丰富还体现在文体的融会创新上，使得小说具有强烈而鲜明的互文性。融现代情境或文化意味于古诗词、歌谣而改之，骈散交织、戏仿频仍，颇有语言冲浪之感。小说结尾对2023年重返大核桃树峪的情景展开美好想象，既与书名“猴儿与少年”散发的青春阳光气息呼应，也表征着对社会未来的希冀与渴盼。

（作者系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教授）